

西方观念的转移与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

王中平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1211)

摘要: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本是学习西方的思想阵营。但“一战”却使西方发生分裂,而十月革命又使得原来是整体意义的西方,变成了思想对立的两个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传统的西方)与社会主义西方(新式的西方,即“新俄”)。两个西方的出现,使得留学生对西方这个学习对象发生了观念上的转移,一部分留学生继续学习传统的西方,而另一部分留学生则学习以“新俄”为代表的新的西方。这样,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留学生群体,在西方观念上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不能继续过去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在此情形下,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想的激进化态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群体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初步形成,并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得到巩固和壮大,从而构成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层。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西方观念;五四时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2-0016-12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2.003

The Concept Transfer About the West and the Group Formation of Marxist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WANG Zho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211, China)

Abstract: The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in modern China were the ideological camp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However, the First World War caused the West to split,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made the West with a whole meaning in the past, become two Wests with opposite ideologies: capitalist West (traditional West) and socialist West (New West, namely “new Russia”). The emergence of the two Wests had caused the overseas students to change their ideas about the learning object of the West. Some students continued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West, while the other students began to study the new West represented by “new Russia”. In this way, the group of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centered around the *New Youth* magazine had undergone a sharp division in their concept about the West, and they couldn't continue the liberalism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past. In this case, with the

作者简介:王中平(1968—),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研究。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radical situ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ought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the Marxist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problem and doctrine” debate, who were consolidated and expanded in the socialist debate, and constituted the core group of China’s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The group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promo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the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the group of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the concept about the West;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研究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不仅可以解释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也可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特征有所把握,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这里所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是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一致的群体,以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特征。在笔者看来,把握五四时期思想界西方观念的转移,乃是研究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形成的关键环节。因为,五四时期的留学生群体本是思想统一的学习西方的群体,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从中分化出来,这乃是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学习西方观念发生转移的重要表征,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变动的轨迹。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是如何因为西方观念的转移而形成的呢?这一形成过程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程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本文试结合五四时期思想演变的实际,从思想界西方观念的转移切入,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新文化运动中西方观念的衍化与留学生群体思想的分化

新文化运动在兴起之初,《新青年》结集的留学生形成了一个标准的学习西方的留学生群体。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留学生认同西方,具有文化上的共同性,肯定西方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体——西洋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

的发展造成危机,引起了中国留学生阵营对西方的深思,西方的整体性在留学生的认识视野中趋于瓦解。

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便在中国的留学生心目中逐步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西方,起初是协约国的西方与同盟国的西方的对立,后来随着战局的明朗,认识到是传统的西方与新式的西方的对立。所谓传统的西方,是指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所谓新式的西方,是指以十月革命后的“新俄”为代表,包括正在进行革命的德、奥等国家。还在俄国二月革命之时,陈独秀就肯定“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鉴于对世界大战影响的认识,陈独秀对俄国二月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1]由此,陈独秀表明自己祝贺俄国革命成功的态度。陈独秀所划分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战前的世界与战后的世界;俄罗斯革命显然是“革”战前世界的命,亦即“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从陈独秀对俄国革命作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战后欧洲形势的“全然改观”,则是预言将出现一个新式的西方(以俄罗斯为代表),与传统的西方(战前的欧洲)呈对立之势。这说明,陈独秀对西方分裂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当时的一般人仅仅将西方分为协约国与同盟国的认知,他将俄罗斯作为一个新式的西方纳入自己的认识视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一战”刚刚爆发时就估

计“战后欧陆民主党必占优胜,德奥之社会党工党必将勃起,或竟能取贵族政体而代之。俄之革命党或亦将勃兴”^[2]。同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对俄国十月革命亦抱有浓厚的兴趣,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议和能够成功,则“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3]。如果说,胡适对于俄国经过革命成为“民主”国的事实,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此时的俄国(即“新俄”)与传统民主的英、法、美之间有着本质性差异的话,那么,张奚若对俄国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时人将“新俄”的十月革命类同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新式的西方所表征的思想面貌和价值取向实际上已暗含在张氏的认识视野之中。李大钊对西方分裂的理解更为深刻,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整体的西方不仅分裂而且产生出一个崭新的文明——俄罗斯文明。还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李大钊就预测到俄国的社会变动对世界、对中国将发生深刻的影响,他说:“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巨。”^{[4]84}李大钊不只是揭示西方分裂的事实,也不是一般地考察俄国在西方分裂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突出之处是在十月革命发生后作出积极的反应,鲜明地指出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4]217}要言之,俄国十月革命所奉行的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4]243}。这里,李大钊强调

西方分裂有着本质性的含义,并向人们提示西方分裂的结果是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大钊还进一步预测了西方分裂继续扩大的趋势及其所表现的“社会革命”形式,并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阻挡:奥、匈革命,德国革命,其“革命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4]246}。由以上留学生的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言论来看,五四时期的留学生群体已经逐步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西方在事实上产生了分裂,而且这种分裂是一种世界大变动,使得原来是整体意义的西方变成根本对立性质的两个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传统的西方)与社会主义的西方(新式的西方,即“新俄”),并且两个西方乃是以“主义”而分出彼此的。

留学日本的高一涵和留学美国的张慰慈,虽然有不同的留学经历,思想激进程度也不一样,但应对变动而分裂的西方却有着相似的趋势,而且两人都对现实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显然与他们留学时所学习的政治专业是有联系的,同时也可能程度不等地受到陈独秀的启发和影响。因为根据陈独秀的自述,他不但本人“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而且还“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5]154}。高一涵具有留学日本的经验,是五四时期少有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俄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使他追求的西方目标有着重大的变化。他对俄国革命家表示由衷的敬佩,撰文指出:“俄国新政府里边的人物,不是在先下过狱的,就是在西伯利亚充过军的,不然至少也做过几年亡命客,所以有人称他为‘囚犯政府’。可见得真正的革新家总要受过监狱的洗礼,监牢就是革新家的家庭,在监狱里边做苦工就是革新家的生活。”^①可见,此时的高一涵对“新俄”采取欣赏的态度,“新俄”在他的视域之中不同于传统的欧美文明,这大致能够说明他对西方的认知已

① 涵庐《囚犯政府》,《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

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张慰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对美国和欧洲的西方文明本来就有很好的感觉,到美国留学研习政治并进至博士的层次颇能说明其追寻目标之所在;然而,张慰慈在十月革命后,却积极从事俄国问题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对“新俄”产生较好的印象。对于俄国的新宪法,张慰慈表示高度的赞同,称俄国宪法是“在政治史上开一破天荒的事业”,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许多宪法中,“俄国的宪法最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此宪法根据于许多最新的政府组织法及政治哲学的最新思潮”^①。对于十月革命,张慰慈说:“此次俄国的革命,完全是一种社会革命,他们的宗旨是想把现在社会上种种不公平不道德的事完全废弃,重新改造一个新社会。”^②以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大钊,对张慰慈研究十月革命的积极态度也予以高度的重视和赞赏,他著文指出:“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指《每周评论》,引者注)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6]5}张慰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俄国的态度很能说明留学生这一新的知识阶层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趋向。高一涵和张慰慈的例证尽管具有个案性,却颇能说明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向往俄国及其对传统西方的失望情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趋向。

而李大钊对西方和俄国的态度变化,在五四时期的留学生群体中是有着代表性的。在举国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舆论声中,独有李大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李大钊说:“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4]238}李大钊进而介绍十月革命,并要求人们把目光投向俄国,注重20世纪全世界人类

“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他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246}李大钊的言论影响着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研究马克思主义高潮的到来。《新青年》第6卷实行轮流主编制,各期主编为:第1期为陈独秀,第2期为钱玄同,第3期为高一涵,第4期为胡适,第5期为李大钊,第6期为沈尹默。轮到李大钊主编第5期时,他将《新青年》办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顾照熊)、《马克思学说批评》(凌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马克思奋斗生涯》(渊泉)、《马克思传略》(刘秉麟)和李大钊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些文章虽然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的态度,但大多数文章还是从肯定的角度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并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新思潮”,这亦可见中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由于《新青年》在中国当时的舆论界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所主持的“马克思研究”专号的推出,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走向分裂,已经使中国的留学生对“新俄”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霸权式处置,则使中国思想界激进的留学生对西方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如此又使更多的留学生对西方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在巴黎和会期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著文认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不仅日本而且参与分赃的其他西方国家都是我们民族的仇敌。他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

①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评论》第28期,1919年6月29日。

② 慰慈《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4]322}高一涵对协约国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指出:“现在的世界,尚不是实现公理的时候。”^①又说:“在强盗主义大行的时候,公理仍然战不过强权。”他还说,自己把青岛问题在巴黎和会中的情形写出来,目的是让国人“知道世界革命真是一件万不可缓的事”^②。此时的高一涵对列强的痛恨情绪在不断增长,其所谓“世界革命”的言论乃是五四时期思想激进的突出表征。陈独秀之后则进一步研究西方,认为美、英、法等是同一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并且皆是奉行“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只不过威尔逊说的话好听罢了。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的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际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的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5]248}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态度的转变极具典型的示范意义,其所给予五四时期进步的留学生阵营的影响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巴黎和会这个历史的节点,使得中国的进步知识界(包括留学生)对西方普遍失望,对传统西方不满的情绪在急剧增长。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将西方作为认知的主要对象,其认知对象和学习目标都在转移之中,并将学习西方的进程推进到崭新的高度。不难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大变动,给向西方学习的进步的中国留学生

阵营提供了新的目标选择,俄罗斯文明成为吸引中国思想界的新目标,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的认知以及其学习的对象亦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是整体的追求传统西方的留学生阵营,在新的变动着的国际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这种分化在开始时尽管还不是十分明显,然而这一分化的趋向却存在着并且不断地趋于强化。于是,一部分思想激进的留日学生正酝酿着“以俄为师”的图谋,而“五四”思想界整体趋新的氛围及“社会改造”的大语境又为这种图谋的衍化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这就预示着作为整体性的进步留学生思想阵营将面临着大的分化。

二、“主义”的较量与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初步形成

五四时期思想界中西方观念的转移乃是学习目标的转移,但也是与“主义”的追求与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所谓的西方也是以“主义”的不同而加以认知的。就具体的群体而言,所谓的“主义”乃是思想性群体的根本性问题,故而群体也因“主义”的不同而分野。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将“主义”嵌入到五四时期的西方观念之中,并使“主义”与群体尤其是留学生群体建立联系,这又是考察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重要视点。

《新青年》是有“主义”之所在的,并且这种“主义”也是处在变动之中的。创办时期的《新青年》乃是一个思想上基本统一的自由主义的阵营,自由主义乃是其精髓之所在,并成为其话语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初创时期的《新青年》作为统一性的思想群体,在具体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但这种分歧大致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陈独秀说,在《新青年》同人中,“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5]40}。胡适也曾说:“(陶)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

① 涵庐《青岛交涉失败史》,《每周评论》第21期,1919年5月11日。

② 涵庐《青岛问题在欧会中经过的情形》,《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18日。

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7]胡适这段话提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青年》这一自由主义的群体中,会因留学国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而产生意见上的分歧;而同在英美留学的人,则在看法上“比较最接近”。这可解释的是,在《新青年》中,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其他即使未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也抱有一定的好感,如鲁迅、高一涵等;留学欧美的如胡适、陶孟和等,由于在欧美受到系统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的信念根深蒂固,因而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的信仰,成为后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已经不同战前的西方,此时的西方世界在分裂中产生了新文明的代表俄罗斯,这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新青年》的留学生阵营在实质性上分歧加大,并分化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个思想派别。

西方的分裂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激进的思想意识,更使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思想界在“主义”的问题上出现冲突的趋向,而“问题与主义”论争则是最鲜明的表征。胡适亦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是《新青年》的同人,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杜威来华讲学时,胡适很是积极地宣传和研究,甚至发出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硕的果。”^{[8]280}胡适的预言是否正确是一回事,但这种预言本身足以说明胡适此时对西方的信仰仍旧是很坚定的。正是还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胡适对中国思想界“走俄国人的路”表示不满,他说:“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①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9]胡适的坦率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是国内思想界的趋新大环境、“高谈主义”的“新舆论界”使他发难的,因而他的目的也

很明确——用解决问题的思路来遏制“高谈主义”的盛行。于是,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认为谈“主义”极容易,“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做参考资料”,而且批评一些人“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8]251}。胡适虽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不满,但此文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直接的责难,行文还是比较和缓的,并不是现今有的观点所说的“恶毒攻击”;胡适在对“主义”的批评中,固然意图明确,但也表现出受西方文明熏陶而形成的自由主义的宽容态度。尽管如此,综观胡适全文的主旨,胡适用实用主义所设计的欧美道路是清晰可见的。

李大钊乃是五四时期恪守“主义”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和行为自然也是在“主义”的支配之下,这当然也是与五四时期西方观念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后,李大钊对世界发展的大势把握更加深刻,而且思想极为敏锐,对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十分关注,胡适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李大钊是在1919年7月下旬离京返乡的,在“出京的时候”读到胡适的文章,“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回乡后,因为有土匪骚扰就上了五峰山,于是趁空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以“主义”的见地表示“对社会的告白”。此信就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在文章中揭示“主义”对于“社会改造”的极端重要性,声明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并从学理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的指导意义。李大钊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6]5-6}李大钊主张社会主义,赞成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宣传的是俄国革命的道路。

①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场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关于“主义”的论争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不多,也没有节外生枝,但寓意却是极为深刻的。李、胡都是留学生阵营的领袖人物、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论争在他们之间展开,不能不有他们个人特点的因素,也可能与他们不同的留学经历有些关系。李大钊研究专家朱志敏指出:“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李大钊与胡适留学期间分别受到的东西方国家不同文化的影响和他们本人不同的人生和思想发展道路,使他们之间在思想观点和方法上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李大钊十分注重政治,思想中有赞成革命的倾向,胡适则热衷于思想文化,反对革命,赞成改良;胡适崇尚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李大钊则对俄国文明的价值更为重视;胡适已经接受了杜威哲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较为固定的观察社会人生问题的一套方法,李大钊则从各种思想中吸收营养,不时地探索着新的救国救民的理论;胡适身上有着明显的上层知识分子气,李大钊则有着接近下层民众的心理倾向……也许就在李大钊写作《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后不久,他便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开始热烈欢呼俄国革命,并因而走上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路,他与胡适原有的潜在思想差别便开始日益明显和表面化了。”^[10]朱先生的论述,强调了李、胡思想原有的差异性与二人留学经历和人生道路的关系,特别指出李、胡思想分歧的激化缘于李对十月革命的宣传,这是很有见地的。留学经历及十月革命都直接与国际大环境的演变相联系,特别是十月革命既是西方世界分裂的表征又是导致西方世界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论争虽然表现在李、胡双方思想上的分歧,但思想上的分歧还不是论争发生最初的依据,至少国际大环境的演变特别是十月革命所带来的西方的分裂,是比两人思想原有分歧更进一层的原因。而就论争的实际情形来看,这场论争在中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论争,论争双方的思想凭据分别是新式西方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传统西方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因而论争实际上也是中国走何种西方道路的“主义”论

争。换言之,这场论争实质上是学习新式的西方(李大钊心目中的俄罗斯)还是学习传统的西方(胡适心目中的美国)论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论争。

有意思的是,曾经留学日本和德国的蓝公武也参加了这场“主义”的论争。虽然蓝氏不是要维护俄罗斯的新文明地位,但他在当时是作为“新舆论界”的一方来维护“主义”尊严的,如他说:“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11]从蓝氏的《问题与主义》来看,他当时也是一个趋新的人物,对俄国革命表示相当大的关注,如他论证“主义”重要时说:“像那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极好的一个例。他们当初所以能够成功,都因为共同奉着一个抽象主义。”蓝氏强调“主义”之重要,在于宣传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非常庞杂,但却属于“新舆论界”,故蓝氏的言论有维护新思想界的意义。蓝公武当时是《国民公报》的社长,虽然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对于“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但其所办的《国民公报》在“五四”后却使用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的主张,表现出思想上的激进趋势,故而应该归于“新舆论界”的范围。并且蓝氏还提出:“这文学革命的事业,现在正是萌芽的时候,到处都是敌人。吾辈应当壁垒森严,武器精良,才可以打破一条血路,战倒这恶浊社会。”胡适不仅对这些话表示赞成,而且在致蓝氏的信中称:“我看了先生的白话文章,心里非常喜欢,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12]这说明,蓝公武其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同归于进步思想的阵营,“问题与主义”论争并不是后来史家所认知的那样对立。至于蓝氏后来在社会主义论战中仍然坚持他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从新思想阵营分化出来,那是中国思想界前进的缘故。

陈独秀虽然因为散发传单被捕未能直接参

加“问题与主义”论争,但对“问题与主义”论争很是关注,并明确表示不同意胡适的主张。陈独秀说:“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5]83}显然,陈独秀是主张研究“学理”的,认为即使是“空谈”也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并不反对“主义”,更不主张将“主义”与“问题”对立起来。陈独秀在稍后的文章中鲜明地批评了“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的“一般妄人”,他说:“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又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5]217-218}陈独秀虽然说“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是强调“定方向”(确定“主义”)更为重要,因为“定方向”在前,而“努力”在“定方向”之后,强调的是“主义”对于“努力”具有引领性、决定性的意义。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本来是一个学习西方的阵营,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分道,但双方多少还保持一定的共同认知,并都处于向西方学习的途程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论争也不仅仅是对立,相容的一面大致也还是存在的。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现出对自由主义者思想合理性方面接纳的态度。李大钊就坦率地承认,自己“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并说这是自己读了胡适的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种“觉悟”,表示“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6]2-3}。胡适在收到李大钊的文章之后,将其冠之为《再论问题与主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而把自己先前发表的论文(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视为“一论”,此举显然是有把李大钊引为同道之意。而对于蓝公武的辩论文章,胡适则没有这样看待。这至少说明,李大

钊与胡适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李大钊的态度怎样呢?胡适在论争之后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李大钊对此没有再发表论争的文章,而是集中精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并极力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认为“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论争”,也就能够“解决了”^{[13]234}。李大钊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一直倡导的“容人并存的雅量”,这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主义”信仰与维护的坚贞态度。

“问题与主义”论争使得留学生群体在分化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学派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留日学生为代表人物。正是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之后,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坚持以传统西方作为学习对象,继续着早期《新青年》的自由主义理念,仍然宣传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时人称之为“努力派”。由此可见,在五四时期西方观念转移的语境之中,坚持何种“主义”乃是思想阵营存立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思想性的留学生群体也不例外。而“问题与主义”论争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形成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三、社会主义论战的迅猛推进与马克思主义留学生阵营的巩固

研究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问题,既要看到西方分裂的大背景,更需要在“五四”思想界西方观念转移视域中,凸显“五四”思想界的主体性,这就需要重点地考察进步留学生主动地选择“主义”的这个关键性环节,从而将“问题与主义”论争与社会主义论战这两者在“主义”话语中联系起来。实际的情形是,五四时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自“问题与主义”论争后,虽然已经形成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领导核心,但相对来说还不稳固,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中包括了一些只信仰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就是显著的例证。而“五四”之后社会主义论战的开展,其重要作用是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分子有力团结起来,排除了

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因此可以说,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广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进行的思想纯洁化的斗争,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聚集、思想整合、认知统一的过程。这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阵营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尊西崇新”乃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总体性态势,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活动自然也不例外。当时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五四”思想界,对罗素这位西方名人的到来抱有热切的期望,这可见新思想界学习西方的信念坚定不移。1920年10月,罗素来到中国,并先后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进行了9个月的讲学,对中国思想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东荪就是受其影响的一位。此前,张东荪在思想界一直宣讲社会主义,究其实质乃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亦属于进步留学生阵营。可张东荪在陪同罗素到长沙讲学后,却于1920年11月6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不足600字的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篇短文所说的“教训”是,“救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惟一的病症就是贫乏”,因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的”。张东荪还说,如果说中国需要什么“主义”的话,“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14]。张东荪发表的虽然是一短文时评,但由于他同属于五四时期留学生所组成的新思想阵营,自然引起新思想界的诧异与关注。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张东荪的言论不啻是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于是,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留学生,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一是对张东荪自身思想的突然转向感到诧异与不解,起而指责时评的“资本主义”路向。曾留学日本的陈望道立即著文责问张东荪:“东

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陈望道在文章最后点出自己的意图:“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下去;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15]陈望道的文章是对张东荪言论的最早回应,点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歧,颇带有为留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阵营清理门户的色彩。

二是对罗素是否讲过这样的话的怀疑,要求罗素予以解释和澄清。罗素在“五四”思想界一开始是以“社会主义”形象出场的,尽管新思想界对其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多的了解。而在“社会主义”占据话语权势的“五四”思想界,张东荪敢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公开出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言论乃是以罗素的思想为资源的,颇有些“拉大旗作虎皮”的意味。陈独秀在得知张东荪所传达的罗素言论后,便怀疑是张东荪曲解了罗素的原意,于是给罗素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5]207}在“五四”思想界处于领袖地位的陈独秀公开地给罗素写信,罗素却一直没有回信予以“声明”,表明张东荪的转述没有曲解罗素的原意,这不啻是给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留学生带来很大的失望。

罗素在内地讲学后的“沉默”乃是一种对陈独秀发问的默认,这同时也给张东荪以更大的力量。于是,张东荪也就索性亮出自己的旗帜,这就使社会主义的论争进入激烈的斗争阶段。这样,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留学生分裂的危机迅即变成分裂的现实。张东荪著文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固然出现严重的危机,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之中,并未出现有如欧美那

样的弊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①。张东荪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又进一步说,中国“贫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倒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所以不能“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②。为了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张东荪在《改造》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指出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阶段,不可越过”,因而在中国不可“十二分苛责资本家”;至于“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因为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在此情形下进行社会主义,只会产生兵匪、游民的“伪劳农主义”^③。曾留学日本的蓝公武,也公开出来支持张东荪,在《改造》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再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因此,张东荪这一方仍然是一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阵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留学生阵营。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留学生,在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联结为一个思想纯洁的核心,这一核心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为领袖。陈独秀在论战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中国发展实业的必要,也不反对通过资本集中的办法发展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在陈独秀看来,“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而张东荪正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所以他对于张东荪所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话感到令人“发笑”。陈独秀的观点是,解救中国的贫困,使中国人都过上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④。李大钊也认为,中

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13]80} 陈、李等都强调,在发展实业问题上,用社会主义方法比用资本主义方法更优越,这就坚持了中国“社会改造”的社会主义方向,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但都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因而对当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倾向到中共二大时才得到转变。

就当时进步的留学生阵营而言,陈独秀挂帅督战的意义很显然是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阵营得以巩固和发展,并形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认知。当时远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在得悉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的情况下,立即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声明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表示“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并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16] 其态度之坚定,认识之深刻,思想之坚定,可谓是正在留学的先进分子中的代表。由当时蔡和森对陈独秀的敬佩态度来看,陈独秀在这次论战所建立起的巨大威望,对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留学生阵营是产生很大影响的。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对国内发生的这场社会主义论争也特别关注,他著文对陈独秀的观点给予坚决支持,指

① 东荪《长期的忍耐》,《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② 《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③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④ 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出:“以中国今日的情势,开发实业,似乎已成为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势,其实究用何种方法来开发他,却大可注意。适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会使中国各地布满了外国的资本家。……于是中国的铁路、银行、工厂、矿山、邮电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了。”周恩来的主张是,中国的“实业可以暂时不开发”,但“资本家的机会却不可以多造”;中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共产革命”,只有在“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的情况下,才能“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周恩来的态度很肯定,表示“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17]。由蔡和森、周恩来对国内社会主义论战的表现来看,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正是通过关注这场论战而紧密地团结到陈独秀的周围,这就壮大了“五四”思想界科学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论战将进步留学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来了。陈独秀在论战中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将各种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评价,使社会主义的含义不只是限制在“废止资本私有”这一项内容上,认为应该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所以陈独秀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5]243}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来确立社会主义的含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知。如李大钊曾说:“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

配,此为其目的。”^{[13]5}此后,陈独秀更概括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同时解释说,社会主义不反对“资本集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表现在财产上是“公有”还是“私有”上,两者“所差别的,不过是财产私有的私字和财产公有的公字罢了”^{[5]465}。李达也说,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完全撤废’”^①。陈独秀等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否准确当然还值得研究,但“五四”思想界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论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此时,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制度,已成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知。就思想演进和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来看,社会主义论战使以陈独秀为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阵营得以思想统一和组织巩固,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建立了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总体来看,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论战,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变革选择何种道路,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一批留学生,尽管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时间上有前有后,他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一致,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论战他们才结集起来,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一支新生力量。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阵营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在巩固中通过思想的互动、相互间的取长补短及对中国国情的艰辛探索,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层。

四、结语

以上,基于新文化运动中西方观念转移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生群体的形成问题,重点说明本是思想统一的学习西方的留学生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因西方的分裂而产生思想上的分化,并在“问题与主义”论争及社会主义论战中正式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皆是清末民初留日的归国学生,而非留学欧美的归国学生。其原因就在于,留学生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而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又形成了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留日高潮,且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专业偏重于文科,文科中尤以法政类为主”^[18],这必然使他们倾向于从政治变革上来寻求救国的途径;又因为当时的中日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之中,并且这种对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反日情绪的高涨和革命意识的发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日本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兴起阶段,这就程度不等地影响到留日学生的思想走向及衍化轨迹。事实上,留日学生在思想上呈现出激进化的态势,并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继长增高,故而他们对倡导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同也就在情理之中。而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归国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可谓横空出世,将思想启蒙、文化革新和反帝救亡推进到崭新的高度。此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凯歌行进,受十月革命的重大影响,同时又处于五四运动的“社会改造”激进化语境之中,进步留日学生的“思想启蒙”最终汇聚到政治行动中的“反帝救亡”的历史洪流之中,他们在思想上更加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办法,故而也就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嵌入中国“五四”思想界的历史历程。这样看,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归国后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是处于西方分裂的总体背景之中,表征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观念发生转移的必然性,同时也体现在中国思想界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努力中,这就进一步呈现出五四时期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但推求本源,留学生作为近代中

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力量,在五四时期因西方观念的转移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这在本质上更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突出反映。

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对于此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作用的积极发挥,中国思想界才增进了对外来思想抉择的主动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凯歌行进。历史已经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乃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在“主义”的恪守中推进“主义”的本土化,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阶层。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在五四时期形成以后,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也就深深地留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努力的印记。对此,我们应该基于五四时期西方观念转移的视角,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域中加以研究和分析。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7.
- [2] 胡适. 胡适文集(9)[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99.
- [3] 罗志田.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71.
- [4]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6]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胡适. 胡适文集(7)[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39.
- [8] 胡适. 胡适文集(2)[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下转第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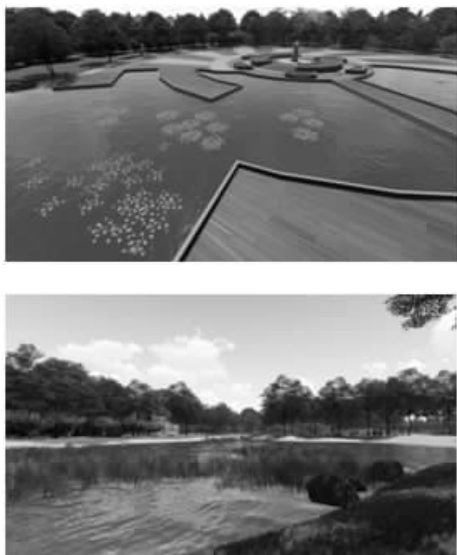


图 29 水生类农作物——水景式配置模式
三、结语

以唐山市玉田县休闲农业园为实践案例,总结出乡村农作物景观主要有模块化、镶边式、嵌入式、棚架式、水景式和轮作式六种配置模式,指出农作物在乡村植物造景中占有重要地

位,因此要在实现其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其与观赏植物的合理搭配,运用园林艺术原理,在关键点、线、面的景观上提升农作物的观赏价值,充分发挥乡村农作物的造景作用,以改善乡村特色景观的整体面貌。本研究立足于国家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将规划学、景观学和生态学的设计理念与乡村景观建设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特色景观配置方案,这对于各地乡村特色景观的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袁军.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休闲农业园景观
设计浅析[J]. 工业建筑, 2020, 50(7): 224
- 225.
- [2] 王译锴. 湖南乡村农作物景观
设计研究[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 [3] 陈乐谓. 湖南农作物与观赏植物景观化配
置研究[D].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27 页)

- [9] 胡适. 胡适文集(3)[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65.
- [10] 朱志敏. 李大钊传[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364 - 365.
- [11] 蓝公武. 问题与主义[M]//胡适. 胡适文集(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60.
- [12] 胡适. 胡适书信集: 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00.
- [13]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4] 东荪.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N]. 时

事新报, 1920-11-06.

- [15] 陈望道. 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N]. 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1920-11-07.
- [16]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74.
- [17] 周恩来. 周恩来早期文集: 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458 - 462.
- [18] 王忠萍.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8(2): 10 - 16.

(责任编辑: 李秀荣)